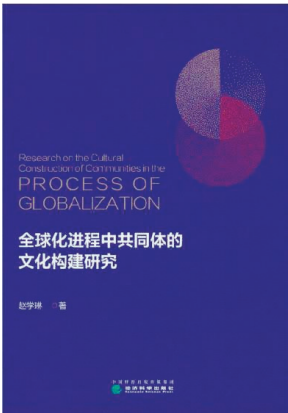


从文化角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陶文昭



《全球化进程中
共同体的文化构建
研究》,赵学琳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4
年10月出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当作伙伴而非对手,让‘同球共济’、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成为时代主旋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文化差异、文明矛盾等问题仍然日益凸显。如何跨越文化鸿沟,增进跨文化认同,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解决的现实障碍。

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重要内容、重要资源和重要方式。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文化冲突加剧的时代,通过增强文化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视角和新兴领域。既是一个具有前沿性的角度,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专著《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在深入研究共同体内涵与意义的基础上,深刻阐释文化在构建共同体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实践功能,准确剖析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文化问题与挑战。在这个基础上,该书充分阐发中国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价值,科学总结共同体建设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原则、目标与取向,探索全面系统的文化战略,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整体性研究成果。

一、深入研究了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研究视角

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心认同和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心基础,文化是构建这一人心基础的“软环境”和“软条件”。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它关系到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们能否建立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进而为全球合作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巩固,能够打破文化隔阂,减少文化误解,增进各国间的信任与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该书指出,文化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领域和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保证和实践动力。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生根发芽,结成果实,前提是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发展的生态要素和生态环境,文化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就像是空气和土壤对于植物一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环境条件。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与机制,有利于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有利于实现全球性文化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贡献全球文化发展的中国智慧和方案。这些机遇和作用,为我们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学、中共党史、国际政治等多学科知识,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创新趋向,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立场与视角,扩展了学术研究空间和领域。该书深入研究了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性,进一步探究了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学理层面的重要联系,提炼了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体现了充分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价值。

二、深入研究了国际文化秩序的中国话语主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动力与遵循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文化维度出发,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打破文化壁垒,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需要准确把握全球文化发展的前沿态势,针对具体问题、挑战及其发展方向,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科学理念。为此,要科学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立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理念和精神滋养,从而为国际文化秩序提出科学的话语主张。

该书提出要增强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能力与成效,积极建设平等、和

平、共进的全球文化格局,实现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国际文化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该书明确了我国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文化主张,提出培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文化多样性、推进文化对话与交流等重要话语,明确了我国对于国际文化秩序和文化关系的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径,并非要削弱或消灭国家主权,不是要抹杀文化多样性,而是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增强人类社会的共同性,寻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点,构建文化共识。

书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态度是,让世界各国和更多的人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国家地位和国家间关系的主张,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环境,做到求同存异,在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系统中形成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是以平等对话、包容理解、求同存异为原则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以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为基础进行的实践活动,是在肯定文化多样性、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活动。

三、深入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挑战,为实施文化战略提供准确的现实依据

传统全球化理论过度强调经济与政治维度的整合,而忽视文化差异导致的对立与矛盾。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发展态势和面临的问题,也直接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认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文明之间固有的文化差异,使得相互理解和认同存在困难。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分布不均衡、全球文化贸易秩序的不合理、西方国家强权政治的影响等因素,也进一步加剧了跨文化认同的难度。

该书对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传播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该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中文化折扣的形成逻辑与应对进行了探讨。文化折扣现象,是跨文化传播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书中提出的降低文化折扣的实践理路,以及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对外传播和国际认同等观点,为我们应对跨文化认同的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明确问题意识,全面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文化冲突、博弈的状况。只有深入分析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问题与挑战,剖析西方文化和文化冲突理论及其战略的负面影响,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从而保证文化战略的适应性和科学性。

四、深入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战略的框架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文化智慧与贡献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国家主权与人类利益、文化主体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等文化关系。要依据全人类发展利益、各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共同取向,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该书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属性,深刻阐释了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战略,形成了文化战略的系统结构与具体措施,发挥中国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中国的文化智慧与文化方案。

该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出发,发挥我国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属性,科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目标,全面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提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战略的科学理念,坚持历史性、针对性、科学性、建设性的科学导向与要求,不断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体系,实现战略的协调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书中提出的我国文化战略主体内容,包括自主开放的文化外交战略、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战略、全球文化治理战略、世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战略、对外文化话语权战略、对外文化开放战略、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等。这些战略既具有理论高度,又具有可操作性,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战略的完整体系,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提供了战略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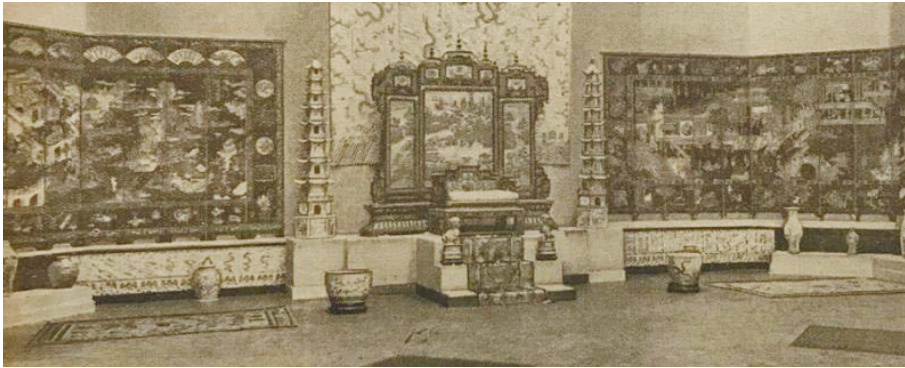
《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也为全球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

未来,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文化战略和实施路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形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故宫珍宝的第一次国际亮相

程 鹄



▲展厅现场照片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中国参展文物由英国“萨福克”号军舰押运赴英,图为中英双方工作人员在军舰上的合影

如果你是一个文博爱好者,如果你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无论身处北平、天津还是上海、南京——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渠道——你会在1934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中英学术界发起大规模学术艺展 定明年十一月间在英举行行政院委员会筹备一切》。筹备委员的名单中,除了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的官员,还能看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名字。这个展览必然和故宫相关。

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拨一点,看一看当时的历史大事件。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930年,故宫博物院设立大规模专门陈列室两处:承乾宫清室陈列室、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添设普通陈列室七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的东北,1933年1月日军进逼华北。1933年2月,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文物南迁,文物分五批运往上海。战争的硝烟隐约可见,国宝南迁,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之旅,往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故宫文物南迁启动后,一个“国宝西游”的故事也在展开——中国文物渡海出洋,第一次以主题展的方式大规模亮相西方世界。回到前段所说的那则新闻,1934年《大公报》说的“学术艺展”正是1935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这就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婉玲在《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以下简称《变局与新局》)一书中要讲述的故事。

这次展会,中国政府共征选了1022件文物,其中故宫博物院提供了铜器、瓷器、书画等735件,古物陈列所提供了书画珍玩47件。这些都是清宫旧藏文物,两项相加,占了参展文物的四分之三强。一方面,说明以故宫藏品为代表的清宫旧藏文物既美且珍,是“本国文化及艺术史上有价值之古物或艺术品”之代言人;另一方面,正如曾经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言,“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秘藏宝笈,一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诸国人矣”。从宫殿禁地走入大众视野中,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的故宫古物,已然揭开了神秘面纱,展现在世人眼前。

作者徐婉玲主要从事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故宫文物南迁”是她一直在做的研究课题。1935年的这次国际展览会,学界习惯称之为“伦敦艺展”。

徐婉玲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考察时,还意外找到了伦

物大量流失事实的反思以及对于当时国内文物保护复杂情状的忧虑”。从这一处就可以窥见作者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之刻苦与圆熟。

阅读这本书,我们经常能在字里行间与文化名人相遇。例如选送哪些文物参展,伦敦艺展筹委会聘请了专家来做这些事,审定陶瓷的是郭葆昌,审定铜器的是唐兰和李济,审定书画的是邓以蛰、徐悲鸿、顾树森,后又请了叶恭绰、吴湖帆和蒋毅孙。而从古物陈列所挑选书画藏品,是吴湖帆带着助手王季迁去完成的。就王季迁个人生涯而言,参与伦敦艺展的筹备工作,使得他能跟着老师吴湖帆亲见大量清宫旧藏书画,这无疑是珍贵的机缘。谁也未曾想到,这个东吴大学法律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一代书画鉴定大家。在他日后过眼各类中国古书画作品时,1935年的这段经历,不知是否会萦绕眼前。

伦敦艺展也是一次规模庞大的中西文化交流盛事,既然是文化交流,难免有阻碍。双方各自说话,有分歧、有妥协,在不断磨合中迎来了好的结局。在书中,也多次展现了这种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分歧。如在策展理念上,中方侧重展品的文化内涵;而英方更注重展品的“帝王”属性。这大概也是西方人从他们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书画的选择上,英方更喜欢选择有帝王题款、印章的作品,如果是帝王的作品则更好;而中方则倾向于选择文人绘画的经典之作。吴湖帆惋惜道:“外间古董家使知重视乾隆御题,致失真龙往往而有,积习误会,可为一叹。”而在展品陈列上,中英双方亦有不少分歧。如对乾隆皇帝的宝座和屏风的陈列,在中方工作人员看来是不伦不类;对部分字画的陈列,没

有完全展卷等。但英方对展品陈列的考虑有自己的逻辑,例如颜色相近的陶瓷放在一起,并不局限于窗口和年代;书画展厅中放入刺绣等,并不是单一从类别上考量。在读到书中所引用的中方工作人员礼貌而克制的抱怨文字时,会更形象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激荡。尽管现在地球已经是“村”,尽管现在在中西方的交流比20世纪要频繁畅通得多,但巴别塔下,隔阂仍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需要以各种方式走出去,让交流增多,摩擦减少。

伦敦艺展展出14周,日均5000余人参观展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历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展览。千余件中国文物,经历11个月的漫长旅程,于1936年5月平安回到祖国。未来的日子,等待这批文物的,将是更波折的旅途。

最后,我想以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来作为文章的结束。1934年11月20日,存于上海的故宫南迁文物开始进行点收工作,原属地明晰的文物归为四类,分别以“沪、上、寓、公”四字来进行分类编排;不明确的,以“全、材、宏、伟”四字编号。这是马衡院长为存沪文物所定的编号。马衡院长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他的任期涵盖了20世纪30—40年代时局最为艰难的岁月。同时,他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寓公”出自《礼记》,原指失去了爵位或封地,寄居于他乡的王公贵族。“沪上寓公”实指清宫旧藏文物离开紫禁城,寄居于上海的事实,难免有惋惜之意;而“全材宏伟”则一扫阴霾,对故宫文物的宏富与精美饱含自豪与骄傲。虽然只是一个编号取名,却也是故宫文物守护者们的心态写照。这个细节满含温度,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散发出丝丝暖意。

(作者为故宫出版社副编审)